

第五章 走向战争的道路

第一節 道奇路線

一 一月選舉与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成立

在美軍總司令部所提出的憲法草案中，甚至还附有選舉法在內。日本保守勢力主張不把選舉法包含在憲法內，由於這一主張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同意，於是它們在法律上掌握了隨時可以修改選舉法的權限。日本保守勢力一方面宣傳議會政治即等於“民主主義”，另一方面則利用這種權限，每逢選舉時，就在選舉的前夕修改選舉法使其對自己有利。正如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時曾修改選舉法一樣，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保守政黨在選舉前夕，以“端正選舉”為口號，在解散議會之前製訂了“選舉法特別條例”。其實這不過是假藉所謂“公營選舉”的名義來限制舉行競選演講會，並對於文字、圖畫加以禁止性的限制。“選舉法特別條例”，為了壓迫進步勢力，嚴格限制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的次數，幾乎使他們不能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和使用宣傳畫進行宣傳；另一方面，則把選舉前的拉攏、挨戶訪問以及黨棍活動等當做選舉運動的主要內容，也就是以所謂“地盤、招牌、皮包”這種勢力、情面和收買為主要武器來保證保守政黨的勝利。日本的報紙和廣播等根據這種情況，都預料選舉結果必然使保守政黨獲得壓倒的勝利，乃是當然的事情。

然而，打開投票箱一看，其結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原來僅有四位議員的共產黨獲得了投票總數的百分之十。當選了三十

五人，一躍而為四大政黨之一。共產黨不僅在大城市中都有當選者（許多是第一位），而且在中小城市和農村中也有許多人當選。這說明了共產黨不僅得到了工人階級的絕對擁護，而且也得到以中小工商業為首的城市居民和農村的中、小、貧農的擁護。也是共產黨本質上不同於其他政黨，共產黨始終不渝地進行日常鬥爭的結果，而它與政治上的腐敗毫無關係這一點同樣是起作用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北平、天津兩地的勝利，也大大地增加了日本人民必須而且能夠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與之相勾結的賣國勢力的信心，這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標榜中間道路政治的民主黨、社會黨和國民協同黨是慘敗了。尤其是社會黨、從黨的領袖片山哲開始起，連同西尾末廣、加藤勘十、野溝勝、永江一夫、富吉榮二、島上善五郎等許多幹部都落選了。國民對於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幹部的叛變，不管它是社會黨的右派或是左派，均曾予以尖銳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一月選舉結果（括弧內係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的結果）如下：

	當選者數	得票比率
民主自由黨	264(131)	43.8(26.9)
民主黨	69(124)	15.8(25.0)
社會黨	48(143)	13.5(26.3)
共產黨	35(4)	9.6 (3.7)
國民協同黨	14(31)	3.4 (7.0)

中間道路政治所失去的選票，除為共產黨所得外，其餘都集中到了民主自由黨的手裏，民主自由黨成了絕對多數的第一大黨。其所以成為第一大黨有下述種種原因，即民主自由黨在被它的與黨稱為“五當三落”（花費五百萬日元的即可當選，花費三百萬日元的便落選）的這次選舉中，花費了巨額的資金；得到了法西斯的壟斷資本的積極支持；許多官僚因預見到美軍總部

的政策而大批地參加了該黨(如以後充任大臣的岡崎勝男、池田勇人、大橋武夫、吉武惠市和佐藤榮作等人都是在這時入的黨)；由於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許多農村都普遍地存在着“自耕農主義”；以及民主自由黨强有力的支柱——地主和富農在農村中確立了統治權。

儘管民主自由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保守勢力却因為看到中間道路政治受到了人民的不信任以及看到共產黨的發展而動搖起來。雖然民主自由黨成了絕對多數的政黨，但還沒有建立單獨政權的信心，於是通過吉田茂來努力從事組織“强有力的保守聯合內閣”。民主黨內部的右派(代替蘆田而任總裁的犬養健一派)也展開了與此相呼应的活動。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吉田、犬養兩個總裁在進行會談中間，曾往訪麥克阿瑟。事後發表聲明稱：“鑒於國內外的形勢，準備以兩黨聯合來求得政治的安定”。這個聲明符合了美軍總司令部所執行的美國政策的要求。但是民主黨內部的反犬養派，在國內外對選舉後所產生的極端右傾內閣的反对輿論以及民族資本家雖然微弱但已開始表示反抗的壓力下，他們主張仍舊在野，因此民主黨終於分裂成為兩派。結果第三次吉田內閣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組成，除了自由黨的閣員外，民主黨犬養派(擁有議員三十四人)也有二人參加了內閣。

麥克阿瑟對民主自由黨的勝利甚為欣慰，他說：“自由世界的人們在亞洲歷史的重要關頭，對保守政治哲學給予明確而又具有決定性的信任，這個熱烈而又秩序井然的日本選舉是可以滿意的”，美國心目中所期望的日本“强有力的政府”，就是這個民主自由黨的政府。

二 九原則、道奇預算、索普建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發表公告，

將決定了日本國民經濟命運的經濟安定計劃付諸施行；次日，日本政府將麥克阿瑟致吉田首相的信件，和這個公告一併加以公佈。這個公告就是命令日本政府實行所謂“經濟安定九原則”，其目的是爲了規定單一匯率（見經濟安定九原則前言），它的方法是：（一）平衡預算；（二）加強稅收；（三）嚴格限制貸放資金；（四）“穩定”工資；（五）統制物價；（六）加強對外貿易和外匯管理；（七）改善物資分配制度以便增加出口；（八）增加重要國產原料和製成品的生產；（九）改善徵糧。

正如美軍總司令部所發表的特別文告中所指出那樣，這個計劃和五個月以前麥克阿瑟對蘆田內閣所提出的經濟安定十原則是“本質上相同的計劃”。但是，也有下列不同的地方：根據麥克阿瑟的信件，附有決不容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反對“九原則”的絕對條件；同時還特別警告日本，美國對日本的經濟援助將視日本執行“九原則”的程度如何而定。此外，美軍總司令部一開始就要求日本國民忍受窮困和不自由。麥克阿瑟的信件中說：“九原則要求日本人民在生活各方面更要勒緊腰帶，暫時放棄在自由社會中所賦予的特權和一部分自由”。

抽象地看，穩定經濟應該是人人所願望的，九原則也好像是很有道理，但問題却在於是誰和爲誰來穩定經濟。美軍總司令部早在事先即已交代清楚，它要求“更加勒緊腰帶”和“放棄特權和一部分自由”。也就是說，九原則的具體內容是在世界經濟範圍內，使日本經濟成爲美元的附庸（見經濟安定九原則的前言）。於是要：（一）從人民手中榨取重稅（第二項）；（二）維持低廉工資（第四項）；（三）對農民加強徵購糧食（第九項）；（四）加強榨取全國人民的勞動（第八項）；（五）設法保證外債和外國資本的安全（第一項）；（六）用上述方法所獲得的資金只能借給美軍總司令部所同意的巨大壟斷資本（第三項）；（七）壓低米價，統制物價，以保證美、日壟斷資本製品獲取最高利潤（第五項）；（八）通過日

本政府來加強美軍總司令部對貿易的管理(第六項);(九)集中資材,以增加美軍總司令部所同意的輸出(第七項)。

美軍總司令部不只是頒發了指令,而且還親自加以執行。

爲了鎮壓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急劇高漲起來的勞動攻勢,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在“九原則”公佈的前夕發表了所謂工資三原則,即:(一)禁止提高工資,以免影響物價;(二)不准貸款給爲支付工資而負債的企業;(三)爲上述目的亦不准支付政府補助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個以保持低工資爲目的的三原則是美軍總司令部一致認爲所有企業部門都應遵守的原則。與發表九原則的同時,黑伯萊對當時正在進行罷工的日本電氣產業工會、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全國煤礦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全國纖維產業工會同盟等重要工會,發出了立即停止罷工的強硬命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接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美軍總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公布外匯管理法以及其他有關管理貿易和外匯的各種法律。儘管它們解釋說這些法律是爲了擴大私營“貿易的自由”,但實際上其目的是爲了外國銀行和外國貿易商人好“自由地”控制日本的貿易,並且也是爲了擴大與它們相勾結的日本大貿易資本家(屬於前日本三井物產系統和前三菱商事系統之類的公司)的“自由”活動的範圍。事實證明,儘管說是“自由”貿易,但是貿易商却受到了和戰時同樣的統制,貿易商在輸出和輸入各項物資時,必須在規定的範圍內領取政府批准的外匯。尤其是取得輸入用的外匯時,須繳納百分之五十的押金。這個條件只是有利於壟斷資本的。同時,除美日貿易外,和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則採取“協定貿易”的方式。所謂“協定”正如後來所簽訂的日英貿易協定那樣,代表日本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由美軍總司令部“代表”日本和對方國家代表簽訂的,日本政府沒有任何發言

權，只有忠實履行業已簽定了的“協定”的義務，這是把日本完全視爲殖民地的貿易協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通商產業省政務次官官幡在衆議院通商產業委員會上的答辯）。

但是，九原則中不僅包含着經濟上的附庸性，甚至還具有更加重要的軍事意義，這一點，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華北和華東的同時不得不迅速表現出來。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率領代理陸軍參謀長兼計劃作戰處長魏德邁和任命爲公使銜麥克阿瑟最高財政顧問的底特律銀行總經理道奇（前美國銀行協會會長）等人赴日，他們與美軍總司令部首要分子就對日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討論，並於視察了日本和南朝鮮的軍備情況後才歸去。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國經濟危機的徵象更加緊迫了，因而極度加強了九原則所具有的掠奪性。

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道奇公使發表的聲明稱：爲了日本經濟的“自立和穩定”，必須撤除曾經作爲日本經濟支柱的美援與日本政府的各種補助金，日本必須用自己的兩隻腳來走路。

正如我們在下面將要詳細談到的那樣，所謂“自立”就是意味着：一面既要盡量削減美援，另一方面又要使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美國；所謂“穩定”則是以這種“自立”爲先決條件，藉使美國資本及其附庸的日本壟斷資本能獲得“穩定”的高額利潤。

麥克阿瑟早已宣佈過，美國的“援助”並不是“慈善”，而是確保“美國取得日本資產的優先權”。道奇自己也對日本國民說過：“和日本國民一樣，美國公民是不願意爲援助日本而繳稅的”（見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聲明）。但是他在一九五〇年對美國下院提出証言時却說：對日援助的主要項目是糧食和棉花，這些“都是剩餘物資”；“因此，對日援助計劃的實際費用主要是這類剩餘物資。在一九五一年度對日經濟援助的總額中，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用於購買美國剩餘物資的”；“尤其明顯而又重要的是，

本年度（指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度——譯者）撥付給日本的援助比日本支付給佔領軍的費用（這個預算是道奇公使編製的——作者）還要少。本年度美國要求從佔領地區救濟資金內撥給的對日援助額為二億七千一百萬美元，與之相比，日本政府支付給佔領軍的款額將為二億九千七百萬美元。日本政府支付給美國佔領軍的這筆錢，如果按照國防省的軍事預算則需要三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對日援助“比其他地區是更為有利可圖的”，“沒有任何國家用如此少量的援助而能換得如此多的東西”（道奇向衆議院歲出委員會提出的聲明及井上、宇佐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所謂“穩定”並不意味着日本國民生活的穩定。在答覆新聞記者提出“由於撤除美援和日本政府的各種補助金將會使失業和破產達到怎樣的程度”的質問時，道奇說：“九原則是一個合理的計劃，必要時將予以隨機應變的調整。至於失業問題，有了失業者時再解決”，這表示他沒有考慮到失業和破產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朝日新聞”）。正如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道奇第二次聲明中所說明的，“穩定”的目的僅在於“為了有效地使用美國政府撥充用以復興日本經濟的資金來確立健全的基礎”。

日本政府雖也懂得了美國政府所要求的並不是日本那種遲遲不前的“復興”，而是迅速的“自立和穩定”；但是日本政府還不能領會到文字以外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所以第三次吉田內閣自以為按照了九原則和道奇第一次聲明而數次草擬的一九四九年度預算案全部被美軍總司令部徹底否定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道奇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美軍總司令部編製的內定預算案。這個預算案以係根據絕對命令的九原則所編製為理由，就原封不動地當做日本政府的預算案，且不准國會修改而予以通過了。

這個美國製的一九四九年度預算的第一個特徵是，它公開

地加強和確立了美國資本對日本財政經濟的控制。在“均衡預算”的名義下，爲了“確立有效地運用美國資本的健全基礎”，竟把支出作了慘無人道的削減。例如在歲出方面的一般會計項下裁員百分之三十，特別會計項下裁員百分之二十；失業對策費削減爲前一年的百分之一；至於爲實施六三學制而編製的建築校舍的預算，則乾脆完全勾銷了。在歲入方面，儘管通貨膨脹引起了物價的高漲，但稅率並未降低，歲入的百分之六十三即取自稅收。爲了強制實行事實上的大規模的增稅，大量增加徵稅費和司法警察費，嚴厲地進行徵稅。這是早就佈置好了一種掠奪國民的預算。

新設立的“對日援助對等資金特別會計”就是這個特徵的典型的表現。正如道奇所說明的，這與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各國所設立的對等資金賬目具有同樣的性質。日本政府有義務將變賣對日援助物資的款項作爲“對等資金特別會計”賬目加以儲存，如售價低於進口價格時，即以日本稅收補充其差額。該款的用途“置於最高司令官的管理之下”，主要用於償還國債和“直接而迅速有利於復興經濟的資本的投資”。但是一九四九年度道奇預算，爲了設置一千七百五十億日元的對等資金特別會計，竟從一般會計項下撥出了一千零八十三億日元的結餘金和輸入補助費（亦即國民的稅金）列入貿易特別會計。“換句話說，所謂一千七百五十億日元的特別會計並非別的，它不是外國的贈與，而大部份是以國民稅金設置的”（風早八十二：“戰後國家財政的實況分析”）。與設置這個對等資金特別會計同時，廢止了復興金融公庫。因此，在戰後喪失了金融能力的日本資本主義，只得被迫以對等資金爲其唯一的基本貸款來源。結果，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以剩餘物資爲誘餌，強力地無代價地掠奪了日本國民的稅金，並以這筆主要來自稅金的資本用作償還外債以及對美國認爲重要的工業進行投資，從而確保其利潤並建立了控制整個日本經濟

力量的財政制度。這與業已規定的貿易管理制度相配合，就基本上完成了使日本資本主義徹底隸屬於美國的機構。

道奇路綫的第二個特徵是在於它是被隱蔽了的軍事預算。首先，撤消政府補助金的原則並不適用於輸入補助金和價格調整費等項目，例如價格調整費達二千零三十二億日元（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八·七，一九四八年度為百分之一三·二），為一九四八年度的三倍以上。這是為了要發展價格調整費所集中扶植的鋼鐵、煤炭、肥料（火藥）、非鐵金屬、蘇打等潛在軍事工業的緣故。而且沒有舉出什麼理由，一下子把價格調整費和戰爭結束處理費編製了十三個月分的預算，這就只能把它看作是軍事預備費了。特別是對等資金不同於一般信用貸款和其他貸款，因為它只能對美國政府所希望的工業即軍事產業集中投資，這並不是“援助”一般的“遠東工廠”和一般的日本壟斷資本，只是給予“遠東兵工廠”和補充美國軍事產業的日本壟斷資本的“援助”。實際上，從對各產業的貸款先後次序來看，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次序是煤炭、電力、化學、機械、纖維；而對等資金一年間的貸款次序則是電力、造船、煤炭、鋼鐵、化學；對纖維產業等部門則完全沒有投資。此外，對等資金也向公營企業的國營鐵路和通信設施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如果仔細地按月份來看，值得注意的是，對等資金貸款的重點隨着朝鮮戰爭的逼近已放在電力、造船、通信、交通等直接軍事生產的部門。這顯示了附庸地位的軍事產業的特徵，即貸款的次序是隨時變動的，因而也是不固定的。

據美方公布，九原則以及具體執行九原則的所謂道奇路綫，都以制定美日單一匯率為其重要的目的。即必須使日元在國際經濟市場上附屬於美元。由於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被削弱，使得截至一九四九年為止，各種商品的進出口外匯率並不一致，其間的差別大約從一美元折合一百五十日元到一美元折合六百日

元左右。如果不這樣，工業就勢必要發生混亂，特別是經營出口工業的中小廠商不能避免虧蝕；因此，對道奇預算感到驚慌的資本家，還樂觀地以為不會在剛剛開始實施九原則時，就強迫日本實行單一匯率。然而，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使美國政府急於強迫實行單一匯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美軍總司令部公布了一美元折合三百六十日元的單一匯率，並於第三天開始實施。從進口方面來看，這個牌價比當時進口貨的平均匯率（一美元折合三百三十日元）約略貶低了百分之十，這樣就使得進口貨也隨着上漲了百分之十。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是一個入超很大的國家，道奇預算明顯地為日本國民規定了這項負擔，預先在歲出中編製了一千億日元以上的輸入補助金。總之，美國的經濟恐慌負擔是如願以償地轉嫁給日本國民了。再從出口方面來看，中小廠商的大部分產品，如果不按一美元折合四百日元以上的匯率出口就要蝕本，因此，這個匯率就勢必要使中小企業破產，使中小企業的工人失業。但是，這個匯率僅僅有利於紡織業等巨大資本的出口。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經濟在犧牲勞動人民和中小企業（不包括壟斷資本）的基礎上，被強制地引入世界經濟內變為美元所指揮的小卒。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美國政府片面通知遠東委員會會員國，決定停止拆遷作為臨時賠償的工廠設備（佔原計劃賠償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從而愈益加強了道奇路綫的軍事性。因此，八百四十五所軍需工廠（計有：前陸海軍兵工廠九十六所，飛機工廠三百零一所，私營軍需工廠一百七十八所）沒有被拆運至國外，其後不久，這些工廠便被陸續地取消了“指充賠償工廠”的名稱，而開始進行軍需生產了（一九四九年“朝日經濟年史”）。

索普^①的稅制改革進一步加強了道奇路綫的掠奪性。一九四九年五月，索普博士為了製訂道奇所沒有完成的稅制改革而來到日本，於九月十五日發表了稅制改革的建議案。

第一，這個建議案以“積累資金”為理由，公開地廢除了公司的過分利得稅，准許資產的重新估價（按照通貨膨脹上漲的程度對資產進行估價），僅徵收其中的百分之六作為估價利益金，並進而廢除了對高額收入的累進課稅。對三十萬日元（在戰前這是免稅點）以上所得金額的課稅率一律規定為百分之五十五。這樣一來，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高額收入者的納稅是很輕的，因而又決定對富人徵收所謂富裕稅的新稅，藉以掩飾這種不公平的措施，但是這種稅也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名義上的賦稅，稅率低得驚人，僅百分之零點三到百分之三。估計可能收到的稅額也不過是二十億日元而已。減少對富人的課稅，又要維持原來的歲收，這就必然要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勞動所得的基本的免稅額降低了，除娛樂稅以外的一切大眾課稅都增加了。索普建議所吹噓的“稅收負擔的公正”，只是有利壟斷資本的“公正”，即給了勞動者以基本的免稅額，也必須給公司和股東以基本的免稅額。

第二，為了“加強地方財政”，索普建議案把居民稅增加了兩倍，取消了以資產為基準的課稅法，並開始採取了按人口和收入為比例的課稅，此外又設立了各種地方稅，並增加了各種地方稅的稅額。特別是設立了包括原來的地租、房屋稅在內的固定資產稅，把稅收一下子增加了五倍。它認為這將能減少地方的許多捐款，從而能夠增加四百億日元的稅收，這就是增加上述各項課稅的根據。它又吹噓說，全部計算起來，可減稅二百億日元。因此，如果捐款不一下子減少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租稅就絲毫也談不上有了什麼減輕。然而，捐款究竟有沒有絲毫的減少

⊖ 索普 (Carl S. Shoup) 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率領“稅制代表團”赴日，他所發表的建議案，是旨在戒諭日本政府強迫吉田政府執行其搜括日本人民的一道法令。吉田政府根據這一法令在第七次國會修改了日本稅法，在第八次國會修改了地方稅。——譯者

呢？如果沒有什麼減少，那就是大量的增稅。而且“加強地方財政”毫無鞏固地方自治的意圖。用平衡津貼制度來代替從前的地方附加稅，反而是加強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單位的控制。稅制本身既然不能規定稅收的用途，但是索普建議案却是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和殖民地時代的印度財政制度極為相似的財政體系。該建議案把原來應由中央政府國費負擔的直接有關國民生活的支出，如實施六三學制以及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事業的費用，轉由地方財政負擔，而將中央財政集中於軍事、警察的開支。

第三，索普建議案以“稅制近代化”“改善徵稅事務”為藉口，增加了易於徵收的大眾賦稅，並把對勞動人民的徵稅方法改為源泉賦稅（對工人從工資中，對農民從徵購糧食價款中直接扣除源泉賦稅，而相反對股東的紅利則不徵收源泉賦稅），加強會計師制度，增加稅務人員的名額，用以鼓勵大資本家的公開漏稅。另一方面則“建議”成立能夠簡便而又嚴格的向工人、農民以及中小工商業徵稅的機構。

上述九原則的具體化和道奇路線的發展是受到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的美國經濟恐慌的影響的，它使日本經濟陷於極為深刻的恐慌狀態，導致國民生活的破產。九原則預先向人民要求的“把腰帶勒得更緊”和“放棄自由”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從而產生了物價跌落、購買力減少、貿易下降、滯貨激增、中小企業破產、不付工資、失業者增多以及農村經濟的破產等現象。

三 第三次吉田內閣與反動勢力

資產階級政黨不僅最後不會遵守在選舉時對國民的諾言的政策，而且一開始就根本沒有想到要遵守它，這就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但像日本民主自由黨那樣徹頭徹尾地毀壞選舉諾言

的政党則是絕無僅有的。

民主自由党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後，就完全撕毀了它在選舉當時曾向國民各階層所提出的各種政策——廢除統制，緩和銀根，取消交易額稅，振興中小企業，自由銷售徵購後的餘糧，救濟災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資，提高婦女文化水平以及改善家庭日用品的配給制度等等。民主自由党甚至連親手編製預算的重要工作也放棄了。它還以“沒有想到九原則是那樣的苛刻”或“沒有領會到道奇路綫的真正意圖”來進行辯解。如果是那樣的話，就應該乾脆地對國民承認自己的估計錯誤，那才不愧是公正的政党。然而自提出道奇預算以來，在三月至四月之間，不僅在野党中間，就是在民主自由党的一部分人中間，也對完全不實行選舉諾言日益感覺不滿。因而引起了所謂不履行諾言的問題。

以吉田茂為首的民主自由党幹部，從一開始就把選舉諾言看作是騙取國民選票的一種宣傳。在公布民主自由党獲得了絕對多數的消息的同時，代表最反動的壟斷資本的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發表談話說：“民主自由党沒有必要拘泥於原來的政策（即選舉諾言），應當堅決實行九原則”，以鼓吹放棄諾言。事實上，由於吉田內閣在無限忠誠地執行了美國命令的同時，並推行了日本壟斷資本本身所要求於日本國民的“勒緊腰帶”和“放棄自由”的政策，因而更形加強了九原則和道奇路綫所加諸日本國民的“進一步的勒緊腰帶”和“放棄自由”，使日本國民陷於窮困和毫無權利的深淵中。

取得絕對多數的民主自由党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撤銷了“非法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成立了“特別考查委員會”。後者除了繼承前者的任務外，並企圖調查“妨礙重建日本的行爲”，將旨在檢舉腐化政治的委員會，一變而為進攻民主主義運動和共產黨的委員會，而改變了

它的性質。民主自由党用这种方法防止了統治階級腐朽情况的被揭露，同時也取得了鎮壓民主主義者的一种工具。

第三次吉田內閣於一九四九年三月末提出了臨時預算，開始施政。爲了必須根據道奇的授意重新編製預算，便向國會提出了半個月的臨時預算。正如共產黨議員志賀義雄所指出的那樣，這個臨時預算在手續上是極其違反憲法的，因爲它是根據當時尚在國會進行審查討論中的財政法（因而還不是法律）而編製的。吉田內閣不是遵守憲法依靠國民的絕大多數，而只是依靠“皮包、招牌、地盤”這類收買和情面關係取得國會中的絕對多數，強行通過了這個臨時預算。

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吉田內閣未經提交正在開會中的國會加以討論，便擅自公布了“團體等規正令”這一所謂波茨坦政令（等於戰前的敕令）。這是將規定取締右派團體和軍國主義分子的一九四六年的第一〇一號敕令加以修改的，用以處罰“助長主張暴力主義方法的傾向或使之合法化”的團體和個人。從法務廳特別審查局（簡稱特審）的機構的調整，並新設立了專事調查左派團體的第四科這一事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法令是以共產黨爲中心的左派爲其對象的。這個法令賦予法務總裁這一行政官吏以判定是否爲“暴力主義”的權利。因此，政府不僅對共產黨，而且對它想要彈壓的任何個人或團體，隨時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予以處分。一個行政官的意志可以一舉剝奪言論、出版、集會、思想的自由等各項基本人權。正因爲這個法令是法西斯主義獨一無二的好武器，所以吉田內閣懼怕人民的反對，不敢提交國會而倚仗美軍總司令部的權勢，公佈了這個法令。一九五二年因爲這個法令將隨對日“和約”的生效而失效，所以吉田內閣在一九五二年製造史無前例的、野蠻的五一事件，使“防止破壞活動法”獲得通過，以便使此項法令合法化。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與美國政府簽訂的所謂處理阿波丸請

求賠償權的協定，赤裸裸地暴露了吉田內閣的法西斯買辦性。阿波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載運俘虜的日本船隻，根據國際協定是不能作為進攻對象的，該船在業已通知美國政府的航線中航行時，為美軍所擊沉。很明顯的，美軍是不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後也不得不承認日本要求賠償損失的權利。但是，第三次吉田內閣却突然簽訂了這個無條件地放棄請求賠償損失權的協定。而它的理由則是日本在戰爭結束後接受美國政府的“直接和間接的援助過多”了。我們曾經再三分析了這種“援助”的性質。吉田政府明確地承認“援助”是債務，並且恭順地在該協定附帶的“了解事項”中，承認“佔領費以及自日本投降以來美國政府貸與日本的貸款以及信用貸款，是日本對美國的有效債務。這些債務只有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方得減少”。不用說，這個協定是背着國民而締結的，也沒有提交國會審議。首先，在佔領下的日本是沒有權利與外國簽訂外交協定的，首相吉田茂不惜蹂躪日本憲法和國際法，把日本的權利出賣給外國，因此他認為外交必須是秘密的，並親自兼任了外交部長。

所有這些政治措施，與其說是出乎民主自由黨或吉田內閣的意見，還不如說大部分是順從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而製訂的。它們雖然也互通聲氣，但是，相反地，民主自由黨或吉田內閣所特有的反動性，有許多地方甚至是超過了美軍總司令部的。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整肅”松本治一郎的問題上，正如根據不容置疑的證據業已證明的那樣，是吉田茂討厭松本治一郎的存在，所以直接懇求麥克阿瑟，無理地硬把整肅令套在他的身上。松本治一郎是一個長期站在解放部落[⊖]運動最前列的社會黨中最左翼的一分子，他在擔任參議院副議長時曾拒絕向天皇鞠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五二年四月號正木昊所著文章）。

⊖ 部落是受差別待遇的日本“國民”。——譯者

可以這樣說，特別是在擁護壟斷資本和壓迫工人運動上，吉田政府甚至比美軍總司令部更為露骨。

當公布九原則的時候，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立即發表談話說：“根據這個（即九原則）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穩定工資的對策，而目前已到了必須直接管制的階段了”。他希望進一步執行美軍司令總部以三原則為中心的對工資的間接管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經濟新聞”）。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在第三次吉田內閣成立的那天，發表了對新內閣的意見書，要求吉田內閣為了“穩定經濟”，“經濟政策應廣泛地積極地反映經濟界的意見”；“特別是勞工政策應以高度熱情”實行（一）直接管制工資，（二）企業合理化和行政整理徹底實施（“失業的發生是必然的”）及（三）勞資協調（工會的“民主化”，強制裁決等）。

民主自由黨無限忠誠地順從了壟斷資本的這些要求。吉田內閣利用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恢復了證券市場，五月連只在形式上妨礙壟斷的禁止壟斷法也加以修改，使其完全失去作用；六月頒佈了日本銀行法，加強日本銀行和私營銀行以及私營工業間的聯繫，“積極地反映了經濟界的意見”。

在勞工政策方面，首先向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強硬的直接統制工資的政策，要求規定最高工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認為九原則已使物價開始下降，最高工資制度反將導致高額工資制度，沒有同意吉田內閣的意見。最後，三月間決定繼續維持間接統制政策。此外，民主自由黨在一九四九年初即開始進行了修改勞工法規的交涉，要求對美軍總司令部提出的第一次草案和第二次草案大加補充；如爭議的強制調停制，罷工預告制，“禁止喧囂的集體談判”，禁止一切政治罷工和同情罷工等等。日本資本家的這些異常露骨的要求，甚至使得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都感到躊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在工人階級一致反對修改勞

工法規運動的面前，不敢完全同意民主自由黨的要求。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美軍總司令部終於提出了它的最後方案，它被作為日本政府的方案提交國會，而於五月二十二日獲得國會的通過（勞動行政研究所編：“現代勞工運動的實況”）。這個“工會法”和“勞動關係調整法”的修改，雖未落到最壞的結果，但是已經嚴重地蹂躪了工人的基本人權。在“確立民主性和自主性”的藉口下，工會需要取得政府的批准，這是與民主性、自主性恰巧相反的。同時，政府加強了以資本家為本位的調停委員會的權利；擁有任意指定“公共事業”範圍的權利，來當做鎮壓工人運動最有力量的手段。於是這就建立了对一切產業部門的工人運動可以在“維護公共福利”的藉口下進行管制的體系。

吉田內閣在製訂這些法西斯法案的同時，又以全力來進行解僱工人。事實上，民主自由黨所履行的公約，除了“修改勞工法規”（改得更壞）外，還有“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解僱工人）、“撤銷交易稅額”（但是却增添了超過撤銷額以上的新稅，並實行了增稅）。強制實行九原則和道奇路綫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有助於解雇的執行，而解雇是作為確立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手段來強制推行的。所以這就與站在反法西斯最前列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發生了正面的衝突。

第二節 三鷹、松川事件

一 企業整頓、行政整理

如同片山哲任首相時所說的“政府正在考慮堅決進行行政機構的改革，作為促進一般企業健全化的榜樣”（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衆議院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所以片山和蘆田的中間道路內閣藉口“產業合理化”和“企業整頓”，大力進行了私營企業工人的解雇，或者藉口“行政整理”解僱國營企業的工人為

私營產業樹立模範。但是這些措施遭到了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擊，“行政整理”遭到完全失敗了，“企業整頓”也幾乎無法實現。

然而，由於生產集中的進展和重稅的壓迫，使中小企業陷入危機，從一九四八年夏季起，發生了工資的遲發和欠發等現象；從同年秋季起，就以營業不佳為理由開始解雇工人。根據經濟安定本部的調查，一九四八年六大都市倒閉的企業數達一百五十八家，被解雇的工人達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一人。

一九四九年吉田內閣所進行的“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也都是出於日美壟斷資本的要求，但是由於實行九原則以及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所採取的毫不掩飾的進攻，其規模、方法及其結果，和中間道路內閣時代的情況相比，是表現得更為殘酷了。

由於以九原則為基礎所產生的政府貸放資金的縮小、政府有計劃地延期付款，以及銀行資本的資金收縮，首先使中小企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因而，工資的遲發、欠薪等現象波及到所有的產業部門，不發工資的現象，從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有了激劇的增加，連勞動基準局的調查也顯示了如下的龐大的數字：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至十二月止，不發工資的事件有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一件，金額達八十五億七千萬日元。勞動基準局本身也承認這個數字只是實際數字的一部分，實際數字當比這高出數倍或數十倍，事實上不發生遲發或欠發現象的經營部門是幾乎沒有的。不僅如此，從一九四九年三月開始被迫倒閉、停工或減產的企業急劇地增加了，此後，一個月的數字就超過了一九四八年一年的數字。據勞動職業安全局的顯然縮小了的估計，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至十二月止，由於企業的倒閉、緊縮而被犧牲的人數達四十三萬五千人，因此，估計至少當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被拋棄於街頭（一九五一年“日本勞動年鑑”）。

這種大規模的企業整頓，如同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一樣，大半是集中於中小企業的。一九四九年度企業整頓的特徵是：壟斷

資本利用企業整頓的浪頭，在大企業部門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員整頓。大同製鋼廠從八千人中解雇了三千人，日本電氣公司從一萬人中解雇了三千五百人，沖電氣公司從六千七百人中解雇了二千八百人，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從二萬二千人中解雇了四千五百人。解雇人數之多，除了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時代以外，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值得注意的是，實行人員整頓的範圍是以電氣通信、鋼鐵、車輛、化學等為中心的部門而進行的。因為這些舊軍事產業部門如果原封不動，是不能發揮作為附屬於美國資本的軍事產業的作用的。解雇是以“企業的虧耗”為藉口的。實際上，如果剷除了由於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所引致的所謂“虛構資本”^①不僅不該是“虧耗”，就是把工資提高二倍或三倍也還是賺錢的。但是，日本壟斷資本一面保持原來的戰爭利潤（戰後把戰爭時期所受到的損害轉移到一般國民身上），一面又計劃重新調整自己，以期依靠美國的備戰政策，追逐新的戰爭利潤。

這個大規模的企業整頓是在美軍總司令部、吉田內閣、保守政黨以及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積極援助下進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和吉田內閣所策劃的勞工法規的修改和行政整理的計劃是與企業整頓一併進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對於重要產業的罷工會嚴令加以禁止（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月禁止煤業的罷工和三月禁止海員的罷工等）。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對於以“產別”系工會為中心而進行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運動曾發出強硬的禁止命令（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通告管“產別”議長）。接着福井、大阪、靜岡、新潟、滋賀、石川等各府、縣實施了公安條例，另有數十個市、町、村也相繼發出了同樣目的的法令

^① 這是指股票持有者對公司的投資，一方面轉化為產業資本，另一方面股票即帶有貨幣資本的性質，成為買賣的對象。因此股票買賣時的上漲價格就是所謂“虛構資本”。——譯者

(約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初至五月底之間)。

爲了幫助大選時受到了國民徹底批判的社會黨，一切反共勢力都向社會黨伸出了援助之手，諸如上自吉田首相在總選舉後發表了希望社會黨重整旗鼓的談話，下至民主化同盟幹部星加、菊川、細谷等人的加入社會黨(二月)，以及日本勞工運動中最惡劣的叛徒佐野、鍋山、三田村等的聯合。社會黨幹部好像爲了符合這些期望似地，發表了對企業整頓的“鬥爭”方針，認爲基於九原則的企業整頓是必要的，只是反對吉田內閣的做法，即反對必須“採取重點生產方式的經濟恢復政策”。此外，高野、武藤、加藤、細谷等日本工會總同盟和民主化同盟的幹部則與以水野成夫、工藤昭四郎等爲中心的“進步的”(以分裂勞工運動爲得計)資本家團體“經濟同友會”合作，成立了以推進勞資協調爲基礎的“合理的經濟施策”的“經濟再建中央會議”(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主持的“勞資協議會”上，主持人、經濟科學局長馬貴特曾說：“現在是勞資攜手並進的時候了。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企業整頓所引起的打擊是勢所難免的”。這難道不就是忠實地按照了這些話而行動的嗎？於是在這些權力及一切反共勢力，特別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援助下，對工人階級強制實行了日本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有意識的企業整頓。

這種企業整頓的殘酷程度，由於道奇預算而愈益加重了。連吉田內閣也估計到包括行政整理在內將出現一百八十八萬人的失業者，認爲其中一百五十三萬人需要救濟，至少需要失業對策費一千億日元。可是道奇預算却盡量削了又削，減到八億零八百萬日元(不及預算的百分之一)。這就是道奇曾經說過的“失業問題，有了失業者時再解決”的具體答覆。這就等於說儘管你被解雇，生命我可不能保證。吉田內閣因違背了它的“周全的失業對策”、“實現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等在大選時的補充諾

言，生存了道奇預算，實行了使數百萬日本人（包括家屬在內）走頭無路的政策，從而赤裸裸地暴露了吉田內閣的毀滅民族的本質。

二 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

一九四九年年初，日本工人階級面臨到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工資因遲發、欠發和不發而大大降低了。年底鬥爭以來禁止罷工的命令鎮壓着他們的對抗。要想突破這個命令繼續進行鬥爭，資本家則又開始了它的企業整頓、行政整理以及修改勞工法規等的全面攻勢。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工人，如果僅在本企業單位內進行鬥爭，則只有與經營者一道成爲壟斷資本的犧牲品。在政治上和階級意識上日益前進的工人階級，遇到了如此急劇不利的情況，也只好暫時退守了。

面對着這個危機，傾全力來制止日本全面法西斯化的是共產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十分之一的國民的支持的共產黨，選舉後向社會黨和勞農黨提出了統一行動的綱領，這個綱領包括反對行政整理、企業整頓、反對修改勞工法規，救濟中小企業和及早締結和約等十三項目（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這個綱領被拒絕之後，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五、六日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決定通過反對修改勞工法規，反對行政整理、企業整頓等運動，把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結合起來，並製定了對地方自治單位的共同綱領，傾全黨的努力爭取成立由下而上的民主民族統一戰綫。共產黨鑒於九原則和企業整頓的被強制實行，各民族產業迅速地受到了破壞，即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發表宣言，號召以工人階級爲核心，團結農民、中小企業和包括民族資本在內的各階級，爲保衛民族產業而共同鬥爭。

由於這些指導形勢開始有了改變。以“產別”系統的工會爲中心，日本工會總同盟，日本工會會議等的下層工會也都捲入了

反对修改勞工法規的鬥爭。這些鬥爭雖然受到了美軍總司令部的禁止，但是，努力於把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統一起來的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全日本電線工業工會等各工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參加者達三十萬人的、事實上即是反对修改勞工法規的罷工。擁護受害者（指被解雇的人——譯者）的鬥爭和反对企業整頓的鬥爭與職業安定所工人的鬥爭相結合，發展成爲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失業的鬥爭。並且，保衛民族產業的呼聲，受到了因九原則而被陷入危機的各階級的歡迎，各企業單位則以工會爲中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召開了保衛通信（指通訊企業——譯者）會議，五月召開了煤炭產業會議等。從地區來看，即在地方財政因道奇路綫而瀕於危機的情況下（認爲財政危機不可挽救而辭職的市、町、村長，截至五月底止數達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佔全國市、町、村長的百分之二十），大垣市議会对日本電氣工廠的倒閉、富山市議会对保土谷化學廠的緊縮，都發表了反对的決議，保衛（東）京、（橫）濱的會議也成立了，這樣，就開始踏進了全國性的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的方向，一時低落的工人運動進入四月、五月後逐漸地高漲起來了，參加五月罷工的人數計達五十三萬人，勞動日的損失達二百三十萬日，爲戰後第二位。

壟斷資本強制實行企業整頓的企圖，受到了工人的反擊而開始被粉碎了。特別是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的企業整頓，一九四八年十月解雇了一萬人，開了大企業的企業整頓的先例。它是“產別”系工會中最富有戰鬥性的工會爲對象的，所以壟斷資本竭力動員了美軍總司令部、警察、民主化同盟、復興金融公庫、帝國銀行以及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等一切反对工人的組織；儘管如此，但由於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會联合会進行了合理的（一個人也不解雇而公司仍有盈餘）恢復計劃和井然不紊的生產管理鬥爭，給壟斷資本以反擊。雖然警察隊曾用暴力接收了該公

司的加茂、川岸兩個工廠（大部分是女工），但也受到了包括農民、市民在內的保衛地方產業鬥爭的反抗。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經理以及經營人員們雖曾自豪地說過：“截至四月底止要裁減四千人”，但是事實上却連一個人也未能解雇而終於在四月底退却了，一直到七月為止，負有經營責任的財界代表們連企業整頓的方案也未能提出。

日本國內外的壟斷資本爲了替私營企業的整頓鋪平道路，必須迅速強制實行行政整理，裁減公營企業的職員和工人。這種行政整理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殘酷計劃，它按照道奇路綫計劃在一般會計項下一次就裁減人員百分之三十，在特別會計項下裁減人員百分之二十，共計裁減四十二萬人。這顯然是要引起反對的。因爲職員被無故免職時還保有要求重新審查的權利，官營企業工人還保有集體談判權和請求調整處理爭執的權利。

爲了對付上述情況，日本政府與美軍總司令部進行協議之後，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向國會提出了名爲定員法的法案。它規定“爲了順利地實行這一次的行政整理”（爲了壓抑反對運動），暫時停止官吏和公營企業工人所享受的上述權利。同時“因爲必須實行平衡預算（在道奇預算的範圍內）”，不能按照正規數額支付退職津貼，因此將根據不經過國會議決的政令（美軍總部的命令）而實行。就這樣依仗美國佔領軍的勢力，不僅蹂躪了承認國民生存權和集體談判權的憲法，甚至連被修改得更壞的國家公務員法和惡劣的公共企業勞動關係法也給違背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國會通過了定員法，並規定自六月一日施行。於是日本政府的裁員工作遂告完成。

但是，這個道奇路綫的中心立法並爲行政整理最好武器的定員法，吉田內閣却未能立即付諸實行。因爲站在吉田內閣面前的是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陣營，還有支持工人階級並開始進

行反抗道奇路綫所導致的民族危机的各階層人民，更有在民族的不滿情緒中迅速擴大了領導力量的共產黨勢力阻擋着它的進路。

道奇路綫導致國民生活的破壞，產生了國民廣大階層與壟斷資本的對立。鎮壓的加強反而使國民鬥爭帶上了民族抵抗的色彩。一九四九年三月的禁止反徵稅鬥爭的命令受到了鬥爭中的中小工商業家的反擊，他們以爭取公正課稅鬥爭的形式，展開了反對一切強行徵稅的權力的活動。禁止對中國貿易的限制，促使壟斷資本中面臨毀滅的民族資本積極準備成立中日貿易促進會議（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成立）。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爲了反對製定殖民地化“大學法案”的陰謀，團結在全國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簡稱“全學聯”）的周圍，發動了保衛教育的鬥爭。儘管美軍總司令部的方針是“不問任何理由不準學生罷課”，但是“全學聯”却提出了增加教育費和立即停止法西斯鎮壓的要求，並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之間，掀起了全國一百多個學校共約有十萬學生參加的罷課。文部省和學校當局對學生進行了強力的壓迫，但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爲首的各校學生所進行的反對處分學生的鬥爭，則一直繼續到六月中旬。

由於道奇路綫所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的暴跌、並遭受“吉普徵糧”、“旋風徵稅”的農村生活是非常悲慘的，自殺、賣身、放棄耕作等現象遍及全國。例如岡山縣的貧農，包圍縣政府進行了不給飯吃絕不回去的強硬鬥爭。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由各農村團體共同主持召開的全國農民代表會議，曾不顧屬於民主自由黨和日本農民協會主体派（日本農民協會內分爲主体派及統一派——譯者）主持人的反對，對吉田內閣進行了批判。在接着召開的日本農民協會大會上，主体派與統一派分裂了，擁有多數議員的統一派正式開除了野濤等主体派的幹部。於是，日本

農民協會內部業已認識了社会民主主義真相的社会黨員和勞農黨黨員等，例如在茨城縣，就率領了他們的組織集体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在東京三田職業安定所開始的臨時僱工的鬥爭，隨着失業者的增大而迅速高漲起來。這個鬥爭獲得了如下的成果，即迫使政府在五月下旬答应了超过預算以上的就業，六月中旬又迫使政府答应了增加實際工資，也就是說用實力打破了國家預算的限制。日本工會總同盟、民主化同盟和社会黨等的幹部，當五月間勞動攻勢達到最高潮時，因為他們不為實際加在工人身上的貧困和剝奪工人的權利而鬥爭，反而說：實行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是不得已的，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橫行是因為共產主義者使用暴力的緣故，所以脫離下層羣衆中開始被孤立起來。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舉行的琴平大會中，民主化同盟不得不把它唯一尚握有指導權的國營鐵道工會的指導權也轉移給共產黨和革新聞盟的統一派了。於是勞工法規的修改和定員法的通過反而加強了工人為了自衛的團結，而道奇路綫的進行和法西斯的逼人，也開始造成了以工人為中心的國民的一致反抗。

而且鬥爭的高潮已達到對法西斯主義採取先發制人的進攻階段。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東京都會議與美軍軍政部相勾結正企圖提出公安條例的時候，以東京交通工會、全日本電線工業工會和全日本化學工會等為中心的工人階級，連日與失業者、家庭婦女和學生携手並肩湧到了東京都政府。五月三十日晚，警察隊揮着警棍向集中於都政府的三萬人的遊行隊伍亂打，拘捕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六十五人，甚至發生了把女學生的裙子都撕掉了的暴行。當遊行隊伍不因負傷而屈服，正對警察的暴行進行抗議時，警察隊在黑暗之中把東京都電車公司的售票員橋本金二從會議廳的三樓推下去，並拳打腳踢地把他害死了。

憤激的遊行隊伍與聲援隊伍一起立即湧到了警察廳進行了抗議遊行。這個遊行隊伍用實力衝破了禁止舉行遊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前面的地區。這也可以說明，羣衆已自覺地認識到究竟誰是公安條例中所隱藏的日本法西斯的幕後指揮者。

次日（五月三十一日）橋本金二所屬的東京交通工會柳島支部抗議對橋本的殺害，決定立即進行罷工。掌握着東京交通工會指導權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說：公務員的罷工是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拚命制止這個罷工。但是，柳島支部副書記大塚庄司躺在鐵軌上說，如果要開動電車就把我軋死吧。終於，柳島支部和目黒、廣尾支部都相繼進入了罷工。與柳島相近的火車公司、日本無綫電公司、東京芝浦足立工廠、三菱製鋼和日立龜有等私營企業的工會也轉入了同情的抗議罷工，進行聲援。於是因自己的夥伴被殺而引起憤怒的工人終於粉碎了警察、憲兵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壓迫。

這次的五·三〇事件以及包括公務員在內的對此立即進行抗議的公開政治罷工，對於面臨着即將根據定員法而進行行政整理的一切官公廳工會，給予了莫大的有力支援。特別是對於因行政整理而必要解雇十二萬人的國營鐵道工會的影響更為重大。國營鐵道工會對行政整理問題，具體地指出了：有鑑於國營鐵道尚未從戰爭的損害中恢復過來的現狀，特別是有鑑於鐵軌、隧道和六三型電車等的危險事故，為了防止這些危險，反而有增加人員的必要。國營鐵道工會發動了反對裁員保衛國營鐵道的鬥爭，並與政府正面對立起來。當日本政府為了試行定員法，命令自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起在東京鐵路管轄下的二十五個路段實施以加強勞動和裁員為目的的新值班制時（五月二十五日），這些路段一致表示反對。其中，東神奈川、蒲田、千葉和中野等路段拒絕了按照新值班制而工作。橋本金二的殺害事件以及因此而發動的抗議罷工，大大地刺激了這些分會的鬥爭，使

它們通過舊值班制進行了實際上的業務管理，並召開車間大會進行了車間鬥爭，進入了事實上的罷工。一九四九年九月，鐵道當局解雇了反對新值班制的東神奈川和千葉地區的領導人，並且以妨礙業務的罪名採取了向檢察廳對他們起訴的手段。這就使得東京鐵路管區的各路段和電車區同時舉行了罷工。中野、蒲田和三鷹等地區從九月十日開始，八王子和下十條等地區從九月十一日開始，相繼進入了罷工。因此，中央、京濱、東北以及鶴見等電車綫的行車完全停止了，橫濱和總武綫的行車也幾乎陷入了完全停止的狀態。這是自有國營鐵道以來第一次發生的嚴重狀態。而且在這個期間，工人的鬥爭與一般市民的聲援結合起來了。如在東神奈川電車區，發生了所謂人民電車事件，即工會接受支援罷工的乘客的要求自動地開動了電車（官方曾以“共謀行駛電車危險罪”對工會會員起訴，結果法院宣判工會會員全部無罪）。

自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起政府與國營鐵道工會之間前後進行了三次談判，但事態仍然未能夠獲得解決。於是美軍總司令部出面干涉了。九月十一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的特別聲明中說：“前經通過勞動科代科長艾彌斯告知國營鐵道工會，電車罷工是非法的、違反佔領目的的行為，並曾命令國營鐵道當局，在工會停止罷工前不得與之進行交涉。”對國營鐵道工會發出的命令是：“立刻命令停止爭議”（離開這個房間後立刻停止爭議）、“爭議行為如不停止則禁止進行集體談判”。國營鐵道工會各分會、各支部要求繼續罷工的呼聲仍然很高，但為了保存力量準備對付定員法的實施，便發出了停止罷工的命令。因此，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立即乘機利用這個禁止命令宣稱：“這次國營電車罷工也是由於共產黨採取了過左的戰術——暴力革命而引起的”。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這種宣傳受到了國營鐵道工人的反對，在熱海舉行的國營鐵道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以多數通

過了“在行政整理問題上，如遇到最壞情況時，可採取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鬥爭”的方針，決定與政府鬥爭到底。

形勢是倒轉過來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反法西斯勢力掌握了主導權。從這個時候起，大家都已知道單憑政府或分裂主義者的力量是不能實行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的。

三 下山、三鷹、松川事件

戰後，日本流行着一句美國話，即所謂“大量散播”，它的意思是通過無線電、報紙、雜誌、電影以及其他宣傳機構，向大眾大規模地灌輸某種意見，在美國，它是捏造輿論，特別是捏造反蘇反共思想的有力武器。

在通過美軍總司令部的直接領導、檢查制度、以及“新聞規則”^①等制度而被驅向指定方向的日本新聞“報道”中，從一九四九年六月初開始，特別報道得更多的是：第一，所謂妨礙列車行駛的消息；第二，所謂共產黨人八月暴力革命說；第三，所謂留在蘇聯的日本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們希望回國的消息。

關於妨礙列車行駛的報道，幾乎充斥了每天的報紙和廣播，經國營鐵道工會仔細調查後，結果發現這些都是在每年春夏間許多孩子們所搞的頑皮把戲。但是官方絲毫也不追究它的原因，反而利用它在報紙和廣播中報道成爲不可理解的事件，暗示這些似乎都是國營鐵道工會會員所作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雖然也向一般國民揭露了這是有目的的宣傳，但是還沒有覺察到偏偏在這年（以前也沒有，以後也沒有）進行這種宣傳，是意味着具體的危險已在逼近了。

所謂共產黨八月暴力革命說，是民主自由黨的半機關報“讀

^① 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的關於限制新聞報道和編輯的規則。——譯者

賣新聞”早就報道過的，特別是自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民主自由黨廣川廣彥（幹事長）發表了“共產黨企圖在八、九月間發動暴力革命”的談話之後，這個談話就被各方面加以強調了，其中，站在这个反共運動的前列的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和“產別”民主化同盟派幹部為協助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而召開的恢復國營鐵道共同鬥爭的會議上，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細谷松太和島上善五郎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們，故意肯定說共產黨計劃在八月舉行暴力革命，通過了要求召集臨時國會以制止共產黨的暴力的決議（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這些八月暴力革命說的唯一而具體的根據是德田總書記在六月舉行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曾說到“日本的經濟危機比法國和意大利還要嚴重，比普通所說的恐慌還要慘得多，這表示了革命正在加速來臨”。事實就是如此，從這裏是找不出什麼八月革命說來的。

關於促進留在蘇聯的日本人的回國的問題，自从三月麥克阿瑟致函盟國對日委員會以來，就動員了所有的宣傳機關進行宣傳攻勢。但是蘇聯宣佈，在一九四九年中將送還除戰犯以外的全部日本人，並且當日本迎接遣返者的船隻抵達蘇聯時就立即開始了遣送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第一批回國者在舞鶴港登陸時，他們都不是當局所期望的那種骨瘦如柴的人，而是載歌載舞、身強力壯、體格強健的人。登陸後，他們為了擁護和平，堅決拒絕美軍總司令部關於蘇聯軍事設施的調查，向國民介紹了蘇聯的輝煌成就和蘇聯擁護和平的熱忱。大多數回國者更進一步地集體加入了共產黨。於是一直高唱歡迎回國者的官方人員，驚惶失措地竭力阻撓回國者與國民相接觸，不僅用棍棒驅散歡迎者，而且在京都事件中，連回國者自己也受到了挨棍棒的“歡迎”。散佈關於留在蘇聯的日本人或蘇聯的謠言的人抓住了“鬥爭”這個字眼，硬把民主的人民批判，捏造得好像是暴力裁

判，或一再製造在苏联尙有三十七万人的神話（參照上杉正一郎：“馬克思主義与統計”，青木文庫版）。除此以外，就再也弄不出別的什麼花樣來了。

这种玩弄的手法雖然失敗了，但是所謂“大量散播”的目的，則在於把同樣的一套捏造的东西反覆地塞到國民的耳中去，哪怕只有一部份人相信，他們就可以乘机採用其它手段來製造鎮壓人民的藉口。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美軍軍政部就企業整頓問題開始了对工人運動的彈壓。廣島日鋼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十日日本製鋼廣島製作所突然公佈了在二千多工人中解僱六百多人的整頓計劃，並藉口該廠被指定為賠償工廠，用美軍軍政部的名義对反抗這個整頓計劃而不肯離開工廠的工会會員下令撤退。工会要求出示軍政部的證明書。六月十三日以達加上尉的名義發出禁止進入工廠的命令。公司動員警察隊開始封鎖了工廠。六月十五日早晨聚集在工廠对此進行抗議的工会會員及其家屬以及声援隊達一万四千人。當時，美國軍隊跟隨着二千多名武裝警察，闖入羣衆隊伍中逞兇，演出了使十個人重傷，三百多人輕傷的暴行（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但是，這個事件反而使廣島各处的全部工人團結起來声援了日鋼罷工。不久，市民和農民也參加了声援。不僅如此，這個事件更成爲反法西斯的問題而獲得了全國各地的声援。

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这种方針，吉田內閣自六月十三日以來，屢次召開了內閣治安懇談會。六月十七日動員了五百名武裝警察接收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的加茂工廠。檢舉了一百四十二名工会會員，其中女工佔了大半。六月三十日在福島縣的平市又發生了一個小事件。警察毫無理由地突然拆掉了掛在車站前面爲市民所支持的共產黨的公報板，以煤礦工人家屬爲主的平市市民向警察署提出了抗議，他們面對着警察，靜候代表与警察

署長交涉的結果。這時恰巧下了一陣驟雨，市民便跑到警察署內去避雨。平日只是給人民做壞事的警察慌忙地跳了出來，但看到市民秩序井然，立即又跑回署內去了。因為只是這麼一回事，平市警察署還沒有小題大做。但是，福島地方檢察廳接獲這個報告時，便與最高檢察廳取得聯繫，並不調查一下實地的情況，立即在福島市發表共產黨襲擊並佔據平市警察署，動員了一千多名福島縣的武裝警察，以騷擾罪名，一個一個的逮捕了常盤煤礦最具有戰鬥性的工人。同時，通過所有資產階級的報紙和無線電向全國各處散播這是“共產黨暴力革命演習”的宣傳。

歷經這些過程，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麥克阿瑟第一次發表了明顯地暗示出將使共產黨非法化的重要聲明：

“共產主義者爲了自己的成功不得不進行破壞，於是以自由的盾牌爲掩護，正繼續向着他們違反信義的目標前進，這是這個時代的矛盾之一。現在在我們面前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今後對於這種運動是否應給予法律上的同意承認和保護。”

在這個聲明中，連麥克阿瑟所特有的美麗詞句——遮羞布——也見不到了。

與這個聲明發表的同一天，終於實施了定員法，即作爲行政整理的第一步，由國營鐵道當局發表了解僱三萬名以上的國營鐵道的首次裁員計劃。正當國營鐵道工會調整陣容待機進行決定性鬥爭的時候，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國營鐵道總裁下山突然失蹤了。在連屍體也還沒有被發現的時候，主管警察的樞員國務大臣就聲稱下山是被人謀殺的，報紙和廣播充滿了令人將信將疑的消息，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下山是被共產黨員或富有戰鬥性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暗殺了的。七月六日發現了屍體之後的宣傳也是如此。

爲什麼要進行這種報道呢？現在是很明白的了。關於這一點，“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從美國得到的東西和喪

失的東西”中以“社會消息七年史”為題的新聞記者座談會的記錄是值得引用的。

在這個記錄中，今井（“每日新聞”記者）說：“在下山屍體被發現的前一天（七月四日），下山在國營鐵道裁員的問題上，受到了美軍運輸司令部某少校的嚴厲斥責，因為他沒有把鈴木市藏（共產黨員、國營鐵道工會副委員長）列入解僱名單中。在這以前，他還受到了當時自由黨幹事長增田（即增田甲子七，當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嚴厲斥責。後來某少校跑到下山的家裏去，從午前一點鐘一直呆到三點鐘，甚至還對他說過：像你這樣的混蛋給我死去吧。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報紙上是不能發表的。但是，下山在鈴木市藏為什麼沒有被解僱的問題上是受到了非常嚴厲的責難的。因為這件事情觸怒了當時的政府和美國佔領軍。據下山的妻子說：某少校回去之後，下山抱頭喊痛，幾乎要哭出來了。因此，我最初訪問下山的家的時候，他的妻子突然問道：是自殺的嗎？以後她再也沒有說過是自殺的了。”

山崎（共同通訊社記者）說：“搜查當局首先派去驗屍的鑑定員和第一科的人都斷定他是自殺的。但是，地方檢察廳（東京地方檢察廳）却通知說他是被人謀殺了的，要大大幹一場。”

今井說：“那時候，當時主管國家警察的樋貝國務大臣還沒有接到報告就發表了下山是被人謀殺的談話。不用說，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國營鐵道的罷工。我見到了樋貝先生，也見到了當時的其它政府人員，他們說如果下山不是被人謀殺，事情就難办了。當時的氣氛是如此的。使我直到現在還不能理解的是……他（解剖下山屍體的東京大學醫學院教授）所說的話，他說下山是自殺的，這是一種違反國民立場的說法。他還說學問究竟是應該為國家服務的。……這就可以了解東京大學是怎樣受到政治的支配了”。

在這裏應該追究的，並不是下山總裁的死究竟是自殺或是

被殺的問題(从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也有被殺的可能,而且很有可能是被最高當局方面下手殺害的)。

作為一個歷史問題來看,其所以嚴重,是利用下山總裁的死來對付共產黨和戰鬥的工會會員,阻止了國營鐵道工會的“使用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行動”,並強制實行解僱。事實上,由於發生了這種日本勞工運動史上史無前例的奇怪事件以及反動勢力利用這個事件進行了總攻擊,以致動搖了國營鐵道工會的反攻計劃,失去了進行決定性鬥爭的機會。

統治階級進行了追擊。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向來以討厭新聞記者聞名的吉田首相,破例召集了特別在下山事件的宣傳上充分與政府合作的六大資產階級新聞社的社長,給予慰勞;同時還發表談話,表示決心說:“在國營鐵道問題上,政府計劃給共產黨以徹底的打擊”,要求他們給予協助。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也一概被動員了。七月七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把當時國營鐵道的民主化同盟的代表星加要叫到總司令部作了很長時間的談話。七月九日,社會黨發表聲明說:“應該先排除共產黨員,然後再進行集體談判”。增田官房長官看到這個聲明便對新聞記者聲稱:“由於下山事件的發生以及民主化同盟派的積極活動,加強了國營鐵道工會協助行政整理的傾向”。翌日(七月十二日),星加要會見了民主自由黨幹事長廣川,達成了某些協議(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及鈴木市藏:“永不滅的信号”)。

就這樣,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國營鐵道當局發表了第二次解僱計劃,被解僱者達六萬三千人。這與第一次解僱有所不同,很明顯的,它是一種政治性的解僱,解僱的對象是包括着共產黨員和具有戰鬥性的工會會員。

然而,國營鐵道工會已經擺脫了由於下山事件所造成的暫時的混亂現象。中央鬥爭委員會立即發出了拒絕解僱的指令,

並配合着進行下層工会退回解僱書的鬥爭；七月十五日，向國營鐵道當局提出了“情況正在進入最險惡階段”的最後警告書，表明了將採取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行動爲反對解僱而鬥爭的態度。國營鐵道工会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與有力的支援組織的成立有關係的，即：反對法西主義的全國各民主團體於七月二日組成了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擁有一千一百十三萬盟員）；爲了糾正下山事件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的報道，傳播站在工人立場的民主報道，從七月六日起舉行了民主團體新聞的共同編輯會議，以期通過民主團體的機關報的編輯工作建立統一戰線；全遞信從業員工會以及其他全官公廳的各工會建立了反對行政整理的反攻體系，並明白表示予國營鐵道工会的鬥爭以積極援助的方針等。很明顯的，國鐵第二次解僱與第一次解僱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它遭到了強大的反擊。

這時候再一次發生了奇怪的事件。在國營鐵道工会中央鬥爭委員會發出了最後通告的七月十五日夜晚，三鷹車站一輛無人駕駛的電車突然衝出了車庫，使六人死亡和十三人負傷。在事件發生後的三十分鐘，當局就大肆宣傳說這是共產黨有計劃的暴動。同時，警察和民主化同盟派工會會員不知何故竟以收拾肇事地點爲藉口，完全毀壞了一切可做證據的重要東西。於是，第二天早晨毫無任何證據就立即接連逮捕了共產黨員和左傾工會會員。檢察當局並且公佈：“這是有共同陰謀的可怕的共產黨的暴力行爲”。報紙、雜誌和廣播則利用一般國民容易相信被捕者就是犯人的心理，千方百計地進行了離間國民與共產黨及國營鐵道工会關係的大力宣傳。例如“讀賣新聞”在報社內僞造了司機台上帶着繩子的照片，把它作爲確鑿的證據用很大的篇幅來刊登。政府方面，這一次也故意地由吉田首相親自發表了“正在警戒共產黨”的聲明（七月十七日）。

三鷹事件與共產黨毫不相干，現在只要看看控訴審判中判

決無罪的理由也就明白了。甚至目前仍被視為犯人的非黨員被告竹內，除了他的“自供”之外，也沒有任何物証。這個“自供”是在酷暑中連續進行了十數小時的訊問，並給了一切暗示後所造成的“自供”，正因為如此，被告竹內屢次推翻了他的“自供”。儘管自由法曹團（日本的進步律師團體——譯者）提出了証據發出了公開信，但是對於在該事件發生前後行動極為可疑的民主化同盟派工會會員，連一次調查也未進行過。

毫無疑問，三鷹事件與下山事件同樣，是與一九四九年六月初起所進行的“妨礙列車行駛”、“共產黨的暴力”之類的宣傳有着密切聯系的，是利用它來防止公佈解僱通告後的罷工的。兩者所不同的是：三鷹事件是官方所掀起的規模更大的事件，並立即逮捕了共產黨員和工會會員，所以必須進行更加淆亂聽聞的宣傳。這就証明了，官方業已預料到，共產黨和國營鐵道工會是如此強大，而實行第二次解僱是更加困難的。

儘管發生了三鷹事件，共產黨和國營鐵道工會的戰鬥力幾乎是毫未削弱；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統治階級希望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採取露骨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態度。

與三鷹事件的發生同時，發動了較下山事件時規模遠為巨大的有組織的反共、反工人的宣傳。於是共產黨立即根據德田總書記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猛烈的反宣傳活動。為了把那些為資產階級報紙或廣播所隱蔽了的三鷹事件的真相向一般國民進行宣傳，動員了全黨的組織。共產黨員連日日以繼夜地搖鈴四處發賣三鷹事件的號外。各民主團體機關報的共同編輯會議也大力協助了這個反宣傳運動。各工會邀請從蘇聯回來的人參加座談會以及在各地舉行的蘇聯真相報告會，用具體事實的說明粉碎了與反共宣傳相配合的反蘇宣傳。國營鐵道工會決議在這些反擊的基礎上，發動每一工作場所都進行退回解僱書的鬥爭，用實力來粉碎行政整理。即將實行解僱的全遞信從業

員工會以及其它全官公廳的各工會，一面加強反攻體系，一面發出了支持國營鐵道鬥爭的聲明。以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為中心的私營產業中反對企業整頓、反對解僱的鬥爭也日益高漲起來了。

統治階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民主化同盟上面。由美軍總司令部的介紹出席了國際勞工組織會議（ILO、在資本家的領導下謀取勞資合作的國際會議）和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籌備會的民主化同盟派國營鐵道工會委員長加藤閱男，在風潮期間於七月十七日回到了日本。他還未到工會總部就立即與民主化同盟幹部和社會黨左派幹部舉行了所謂麻布會談，會後又立即與預先邀請他談話的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進行了長時間的面談。次日，以違反公共企業勞動關係法的罪名，公佈解僱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的十七名委員。十七名中包括共產黨系統的全部委員十二名，革新同志會派半數以上的委員五名，而民主化同盟派則一個人也沒有被解僱。這個行動的目的是將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的領導權完全移轉到十五名民主化同盟派的手裏。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認為這個解僱通告無效把它退回去了。七月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發表聲明說這個解僱通告是有效的。民主化同盟派在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中央鬥爭委員會會議上說，被解僱者沒有資格任中央鬥爭委員會委員，要求革新同志會的統一派退席。統一派在答覆中指出：作為一個工會會員就有充分的資格並有責任實行大會的決議，以盡對全體工會會員的義務。於是民主化同盟派退席了。同日，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長惠特尼把社會黨總書記鈴木茂三郎叫去了。結果，鈴木曾發表感想說：“我得到的印象是，社會黨已處在超出預料的嚴重情況中”（七月二十二日“朝日新聞”）。七月二十二日，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完全支持民主化同盟的聲明。同日，加藤閱男召開了只有民主化同盟派

出席的中央鬥爭委員會，並向全國發出了僅召集沒有接到解僱命令者參加的中央委員會的指令。下列事實證明，他是無視發出指令的手續和資格的，這個指令竟未能編號，成爲一個所謂零號指令。加藤委員長自己說：“如果可以說這是民主化同盟的‘政變’，我將甘心接受非難”（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矢加部勝美：“勞工戰綫的異狀”）。

統一派曾對民主化同盟提議召開大會，但被拒絕了。共產黨發表聲明說：“惡劣的民主化同盟幹部是民主自由黨的別動隊”，革新同志會派也發表聲明說：“中央鬥爭委員會的民主化同盟幹部假藉合法和反共的名義協同民主自由黨，與社會黨一樣始終一貫地採取了叛變行爲”。於是民主化同盟想籠絡一部分革新同志會派的戰術失敗了。然而，由於民主化同盟的這種強烈的“政變”，使國營鐵道工會分裂成爲兩個，因而對第二次的解僱未能適當地進行鬥爭。民主化同盟派召集的排除解僱者並以次多票候補人遞升爲委員的中央委員會，一直到八月十五日好容易才開成了。這個中央委員會按照民主化同盟的提案，承認了當局的解僱措施，並決定與政府進行交涉時排除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的參加。民主化同盟派說：“這是民主工會的劃時代的勝利”；可是，誰在爲這個“劃時代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呢？

然而，國營鐵道工會中的共產黨和革新同志會兩派却保持統一，深入下層進行宣傳活動，與退職者、退回解僱書者同盟的活動相配合，以便防止第三次解僱。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於七月二十七日發表了鬥爭宣言；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和北海道煤礦等以舉行波浪式罷工打擊了企業整頓。與國營鐵路的情況完全一樣，當局於八月十二日通告全遞信從業員工會解僱一萬一千人，“全遞”內部的再同（民主化同盟）派乘三十六名中央鬥爭委員會中有二十九個人接到解僱書的機會，採取了與國

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派同樣的行動。富有戰鬥性的全遞信从业員工会指令下層工会團結一致進行鬥爭，並於八月十六日相反地从中央委員會中清除了再同派。於是從八月十五日在中央官廳剛剛開始實行的裁員，也遭到了以全農林工会和全商工工会為首的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的激烈反擊。勞動人民由於右翼社会民主主義者叛變而引起的憤怒反映到社会党內部，具體表現在對幹部的批判上面。左派的是立梅市、師岡榮一和和田敏明等人批判了鈴木、加藤和野溝等所謂左派幹部，從七月底開始要求社会党反省，醞釀成立再建派。因此，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就難以強制實行。從七月下旬起，國營鐵道工会、全遞信从业員工会的工人，和農民、山林工人携手並進，在木曾谷發動了山林解放運動。這說明統治階級所最懼怕的工農聯盟的發展方向，已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於是第三次造謠誣蔑事件發生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三時，一列火車在东北本綫松川車站附近翻車，死亡了三個人。報紙和廣播在報道這個事件的同時，還發出了似乎在當場逮捕了國營鐵道工会會員又是共產黨員的嫌疑犯的消息，並加上了事件發生的前夕在肇事地點附近的東京芝浦電氣公司松川工廠召開了工会大會這一段消息，這個報道露骨地放出了該事件與共產黨、國營鐵道工会和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会有關的空氣。同時，事件發生的次日，日本政府立即由增田官房長官斷定說：“在次官會議上曾听取了福島(松川)事件的報告，這次事件是從未有的兇惡罪行。從三鷹事件以來，它與歷次發生的事件同樣，是出於同一思想根源的。”

的確，在與增田長官所說的相反的意義上，這個松川(东北本綫)事件是日本歷史上“未曾有的兇惡罪行”，也是與三鷹事件同樣“出於同一思想根源的”。正如在以後的公審中搞得清清楚楚無可懷疑的那樣，第一，當天晚上發生了盜竊事件，警察隊為

逮捕盜賊正在松川車站附近一帶佈置了特別戒嚴，松川事件是恰好在這時發生的。第二，這一次罪行是利用列車偏偏在那天夜間停止行駛的時間進行的，而知道列車停止行駛的，只有國營鐵道的少數上層負責人以及從他們那裏得知消息的美軍總司令部有關者。第三，作為唯一證據的單口螺絲鉗和螺旋鉗，是警察隊很容易地從泥水田中拾到的，但這兩件東西都不是國營鐵道的用具，如單口螺絲鉗係外國製品。僅憑這些事實而論，就可以知道這是工人或共產黨員不能做到的罪行。顯然，這是官方或與官方有着密切聯繫的人們所進行的極其惡劣的有計劃的罪行（松川事件被告救濟會：“松川事件裁判記錄”）。

自從著名的幸德秋水事件（無政府主義者圖謀刺殺明治天皇的事件——譯者）發生以來，在日本社會運動史上，有許多利用“捏造”的例子，但像松川事件這樣兇惡的已遂事件，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在外國，特別是在美國却是司空見慣的，例如當工人運動或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為了打垮它的力量，便多次地計劃或實行了諸如第一次五一節時所發生的海馬克事件以及有名的摩利·馬凱雅事件，湯姆·牟尼事件，撒苛、樊齊蒂事件等。正因為如此，Frame UP.（捏造）這句美國話已成為世界性的用語了。

與下山、三鷹事件同樣，所有的宣傳機關都按照政府所述說的那樣，把松川事件與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連繫起來，對一般國民進行了反共、反工人的大規模宣傳。在這過程中，檢察當局採取了與對待三鷹事件不同的形式，即不立刻拘捕共產黨和工人（但曾搜查辦公室），而先對流氓、暴力團體等各方面進行調查，之後得出了好像除共產黨和工人外別無犯人的結論。於是根據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因其他事件的嫌疑而被捕的國營鐵道工會福島支部赤間勝見的“自供”，從九月十二日起，逮捕了以國營鐵道工會的鈴木信（他擔任共產黨東北地方委員會候補委員的重要職

務)、同工会支部的阿部信次和本田昇、东京芝浦電氣公司松川工会联合会的杉浦三郎以及該區鶴見工廠工会的佐藤一(爲了領導爭議鬥爭,以东京芝浦電氣工会联合会代表身分於松川事件發生的頭兩天來到松川)等爲首的二十人。政府很巧妙地、有計劃地把領導保衛民族產業鬥爭的共產黨、領導反对行政整理鬥爭的國營鐵道工会和領導反对私營企業整頓鬥爭的东京芝浦電氣工会联合会湊在一起了。

並且,爲了使檢察官所編造的“因共謀而構成兇惡犯罪”能够成立,捏造了無一合理之处而又駭人聽聞的案証。諸如騙取被告赤間的目不識丁的母親在完全相反的“陳述書”上蓋章,又根據這個“陳述書”和符合於檢察官談話的被告赤間的“自供”(赤間在公審時否認了這個“自供”說它完全是虛構的),不容許全体被告与律師見面,日以繼夜地用尽一切手段逼迫被告“自供”,此外还把氣象台報告的“罕見的晴空之夜”顛倒爲“漆黑之夜”;硬說腳不好的被告用三點半鐘跑了五里道路;硬說騙小孩的活動螺絲鉗可以取掉被一百數十噸重量拴着的螺釘帽;把限於時間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硬說會有事前联系;當場明明破壞了二根螺釘帽,但一定要說只破壞了一根等等。這并不純粹是福島地方檢察局的創作。這個案証是最高檢察廳動員全國各地“有手段”的檢察官所編造的(共產黨出版局編:“真理必勝”)。

与捏造事件同時,官方对共產黨開始了瘋狂的鎮壓。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五百名警察隊包圍了日本共產黨總部,以“赤旗報”用紙有來源不明的嫌疑爲藉口,搜查了“赤旗報”營業所和“曉”印刷所。因爲完全沒有可資捏造的材料,警察隊無可奈何地撤退了;但官方却抓住這個事件在全國各地大肆宣傳,造成共產黨是可以鎮壓的這種印象。

然而,依靠造謠誣蔑和暴力鎮壓,是絕不能使日本工人階級退縮的;決定性的打擊却是來自工人階級內部。

以松川事件為轉折點，全官公廳各工會內部的民主化同盟、再建同盟、刷新同盟以及冠有其他名稱的分裂主義者，與國營鐵路的民主化同盟派一樣，由於犧牲了被解僱者（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佔多數）而把持了工會的實權，或是另組工會，與官方密切勾結，從內部來瓦解工人的統一。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中接受了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領導的各工會，都無條件地接受了行政整理的方案，決議退出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這些分裂派成立了全官公刷新同盟。官方甚至給它們以法律上的協助，特別是人事院於八月十七日公開解釋不承認因行政整理而被解僱者為工會會員，這就替分裂主義者的活動提供了最好的法律根據。

如此強制施行的行政整理，加強了壟斷資本緊縮私營企業的決心。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代表日本的壟斷資本於九月七日向各資本家散發了如下勞動對策：“為了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國際經濟的聯繫……採取合理化即裁員的想法也是出於不得已的。”“首先應該排除經營內部的共產黨員。迄今為止在排除共產黨員時，一般地是否應以不合作者的名義實行解僱，在這一點上會牽涉到法律問題，但是，這次國營鐵道的裁員已給予明確的解答。……這些分子是可以而且必須排除的。”“旨在勞資合作以期加強企業而組成第二工會時，即使這個工會屬於少數，公司施策的重點也應放在該工會上。”“經營者必須徹底進行反共教育。”“足以與工人的團結對抗的就是經營者的團結。”“現在經營者應該開始發動經營者的攻勢。同時，為了取得輿論的支持，當然要和美軍總司令部民事部、監督官廳、警察、法院以及檢察廳等經常聯繫，並不斷積極努力與企業所在地的各機關，特別是報社、通訊社以及廣播電台等輿論機關經常保持密切聯繫”（“為對付目前勞動情勢經營者所應採取的態度”）。

壟斷資本為了實行企業整頓採取了上述的一切手段特別

是私營企業工會內部的民主化同盟派，首先利用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的解雇，在公司、官方、社會黨、“總同盟”和“新產別”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協助下，有的另行組織工會，有的奪取工會的領導權，破壞了工人階級的統一。甚至站在反對企業整頓最前列的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的鬥爭，也因為屬於“產別”民主化同盟派的堀川工廠工會支持公司方案，退出了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會聯合會，加以資方又用大量資金使各工廠各自分裂，於是這一鬥爭到十月間終於遭受了挫折。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所進行的私營企業的企業整頓，主要是在交通（鐵道和海運）、機械、汽車修理、金屬以及電氣器材等軍事產業部門，所以這也可以說是特別爲了以後發動朝鮮戰爭作準備工作。

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央、地方和公團（公私合營的糧食、煤炭等重要物資的配給機構——譯者）實現了被解僱者達六十二萬人的行政整理；即使根據官方顯然縮小了的統計數字，私營產業也實現了被解僱者達四十三萬人的企業整頓。道奇路綫於是突破了第一關。

這對日本國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其結果是失業、購買力降低、農業破產以及從中小企業擴大到大企業的恐慌的尖銳化——一句話，就是日本民族產業的全部破產。它的具体表現就是災害的大量增加。儘管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間的颶風都是中級颶風，但是，由於森林的濫伐、河川工事的停頓以及各種設備的腐朽等種種原因，即使根據政府的估計，所遭受的損失也已達八百二十三億日元。如果加上過去遭受災害而尚未恢復起來的那些損失則共達一千五百二十二億日元。但是，按照道奇預算，却將災害對策費名副其實地減少到幾等於零，公共事業費也從一九四八年度佔歲出百分之一〇點五減少到一九四九年度佔歲出的百分之七點四。因此，使日本民族遭受破壞，這是道奇路綫

開始時就預定了的。而且这在驅使日本走向意味着最嚴重的民族破壞的單獨“媾和”和走向戰爭的道路上，也是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的。

抗日戰爭圖書館
www.krzzzjh.com